

《罗振玉手札》所收罗振玉致杨守敬书札考察

陈 捷

2007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影印出版的《翰札菁华》之一《罗振玉手札》，收录了初次公开发表的罗振玉致杨守敬书札，这对关注杨守敬与罗振玉研究的人来说，实在是一件令人十分愉快的事情。

《罗振玉手札》卷首有书法家叶鹏飞《谨严敦古 温和儒雅——罗振玉的书法艺术》一文，在介绍罗振玉生平及其在书法领域的深湛造诣的同时，从书法鉴赏的角度对该书收录的罗振玉手札的特征进行了分析。从帮助读者欣赏名人手札的艺术性的角度看，这篇文章可谓不负使命。不过文章基本上未涉及书札内容，不免令人略感遗憾。本文拟对这些书札的写作年代、内容和学术背景略作考察，并对这些书札的价值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书札的写作年代

《罗振玉手札》所录罗振玉书札中文章最长、写作年代最为明确的是第七通与第八通。第七通书札中云：“去年秋，法人伯希和学士得我敦煌石室古书，舶载而去，此至可痛惜。”这显然是指宣统元年（1909）秋天法国的东方学者伯希和到敦煌探险之后把在敦煌得到的资料运往国外之事。如后文所述，这年十月，罗振玉与蒋黻、董康等人一起拜访在北京滞留的伯希和，在伯希和的寓所第一次看到敦煌文书的实物。另外，与这通书札同时寄赠杨守敬的新著《石室遗书》应当是指宣统元年十二月董康诵芬室排印刊行的《敦煌石室遗书》，另一种新著《昭陵碑录》则收录于番禺沈氏《晨风阁丛书》，也刊行于宣统元年。从这些内容可知，第七通书札的写作时间应该是宣统二年正月十八日（1910年2月27日）。

《罗振玉手札》所收录的书札照片共有二十一张笺纸，其中第二张最后与第三张最初的部分互不相关，中间显然有遗缺。一部分书札末尾署有写作日或月日，但也有一些未署日期。此外，如后文所考，有些信札的排列顺序从内容上看有明显的颠倒。笔者曾请友人向出版该书的上海书画出版社了解情况，得到的答复是：该书收录的照片完全是按照书札原来的状态和顺序拍摄的。由此可知，这些书札在收藏者手中整理成册时就已经有遗缺及顺序错乱的现象。关于

第二张和第三张之间有遗缺的书札，已经无法判断其本来是一通书信遗失了中间的部分还是原本为两通书信各自遗失了结尾和开头的部分，如果为方便起见将其做为一通书札来计算的话，本书收录的书札共计八通。

在第八通书札中，罗振玉向杨守敬报告他的最新研究成果，说他近来在龟甲牛骨的卜辞中考出了十三位殷代帝王的庙号，并证明这些庙号与《史记·殷世家》记录相符合。又称“近草《殷墟文存》，乃写录近来出土之龟甲牛骨上卜辞”，“夏间当可付印”，表达了他的新著不久即可刊行的喜悦心情。收录罗振玉利用甲骨卜辞考证殷代帝王庙号成果的最早的著作是宣统二年（1910）二月完成的《殷商贞卜文字考》，同年五月由罗振玉玉简斋刊行了石印本。书札末尾署有“十三日”的日期，根据上述内容，可知该书札当作于宣统二年二月到五月之间。

第八通书札在向杨守敬通报殷代甲骨出土的实际地点在安阳城西八里、滨临安阳河的小屯之后，又向详于历史地理的杨守敬询问“安阳河乃俗称，不知即洹水否”。第五通书札中有“安阳河承示即洹水，大感”之句，显然是对杨守敬回答上述提问的谢词。这也就是说，第五通书札应该是在接到第八通书札之回覆后写的。又第八通书札中有云：“长者患疥，远念殊切。此虽纤芥之病，然须以甘肥颐养”，表达了罗振玉对患有微恙的杨守敬的关心，第五通书札中称“敬悉道体健复，至慰至慰”，显然是得知杨守敬恢复健康的消息之后的语气。从这些文字也可以看出，第五通书札的写作时间应当是在第八通书札之后。

此外，第八通、第五通书札的内容让我们联想到胡振宇在《记杨守敬与罗振玉讨论甲骨文之信一帧》中介绍的一通胡厚宣教授收藏的杨守敬致罗振玉书札^①。这通书札只署八月四日日期而没有年代，但是从杨守敬根据罗振玉的“殷墟非盘庚所都”的说法建议其将书名改为《殷墟贞卜文》等内容看，应该是对罗振玉宣统二年出版的《殷商贞卜文字考》提出的建议，由此可知，此信的写作时间应该是宣统二年八月四日。信的后半部分中出现的《北魏防城考》所指当是罗振玉第八通书札中提到的“其草稿涂乙旁午，久未写定，骤无以应命”的《六朝防戍城镇考》。此外，《北魏地形图》乃杨守敬《历代舆地图》中的一部分，是作为《观海堂地理书》第十九册于宣统二年刊行的。罗振玉第五通书札曾言及自己“仅有《前汉地理图》，他亦无有，尚求补赐”。杨守敬将这部新近刊行的《北魏地形图》寄给罗振玉，应该是对罗振玉第五通书札的回应。从这些情况分析，胡厚宣教授收藏的杨守敬书札的写作时间应当在罗振玉第八、第五通书札之后，署有“二十五日”日期的第五通书札的写作时间则至迟应是宣统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除了上述三通书札之外，第一通、第二通、第六通书札中也有一些可据以

^①胡振宇：《记杨守敬与罗振玉讨论甲骨文之信一帧》，《中国文化》第十五、十六期，1997年。

考察写作时间的线索。三通书札末尾都署名“后学罗制振玉”，据此可知这些书札均写于罗振玉服丧期间。根据罗振玉的回忆录《集蓼编》及罗继祖《永丰乡人行年录》，罗振玉的父亲光绪三十一年（1905）十月故去，翌年光绪三十二年（1906），罗振玉在端方的劝说下前往北京，在荣庆的要求下，以服丧期间不领俸禄为条件，留在北京任学部参事厅行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他卖掉上海的住宅，全家搬到北京。罗振玉服阙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春天，署名时用“制”字的这三通书札的写作时间应当都在这一期间。

那么，这三通书札到底是写于罗振玉服丧期间的哪一年呢？首先，第一通书札中有“又承允赐《贞元释教录》及石印《董美人墓志》、《悉昙字记》等书”之语，提到了清末在西安出土的隋开皇十七年（597）石刻《隋美人董氏墓志铭》拓本的石印本。现在保存在湖北省博物馆的杨守敬题跋书札手稿中有一篇末尾署有“丁未五月二十四日”日期的《隋董美人墓志跋》，其中有一段文字曰：

余以海内妮古之士向往此志久矣，光绪丁未携至上海石印。甘君翰臣见而爱之，且出重值求让。余惟此志已得石印，余传古之情已慰，何必秘此原本私为独有。且翰臣真知笃好，方并余所藏《元公》、《姬氏》及《尉富娘》三志，合此为四隋志，颜其室曰“隋斋”。付托得人，夫复何恨。

据此可知，杨守敬将《隋美人董氏墓志铭》拓本付石印的时间是在光绪丁未，也就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五月^①。该资料中的《尉富娘墓志跋》中又云：“念妙迹几绝，久欲付诸石印，未果。丁未五月始携之沪上，克成此志，而年已七十矣。”说明出让给甘翰臣的“四隋志”中的《隋尉富娘墓志》亦即《隋武卫大将军吴公李氏女墓志》^②的石印本也是光绪三十三年五月杨守敬到上海时与《隋美人董氏墓志铭》同时印行的。

不过，关于杨守敬这次暂居上海的时间，还有另外一种不同的记载。杨守敬自撰的《邻苏老人年谱》光绪丙午年（光绪三十二，1906），项中有下面一段叙述：

三月，两江总督端午桥招余至金陵署中题跋所藏金石碑版。四月至上海，寓甘翰臣家。时翰臣为怡和洋行总办，酷爱余书法，故邀余主其家，殷勤备至，并为推荐同乡，不憚齿颊。不两月已得千馀元。翰臣又买余汉甘露铜釜及隋《元公》、《姬氏》、《董美人》、《尉富娘》四墓志，复得千馀元。

如果按照这段记载，杨守敬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应两江总督端方之邀前往南京，接着于四月到上海，在甘翰臣家寓居将近两个月，这与前面引用的跋文中“光

①杨先梅辑、刘信芳校注：《杨守敬题跋书信遗稿》，成都：巴蜀书社，1996年，第61-62页。

②杨守敬《隋武卫大将军吴公李氏女墓志跋》云：“（李氏女）周尉迟纲之孙女，姓尉，字富娘。”

绪丁未携至上海石印”的说法相差一年。

两种记载均出自杨守敬本人之手,到底应当相信哪一种呢?

从这一时期端方的动向来看,光绪三十一年六月,端方被选拔为出洋考察西方宪政的五大臣之一,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1905年12月19日)从上海出发,对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丹麦、俄国、意大利、荷兰等十几个国家进行考察,翌年回国,7月21日返抵上海^①。因此,他不可能于光绪三十二年三月邀请杨守敬到南京来为他收藏的金石碑版撰写题跋。检当时家住南京的缪荃孙的日记《艺风老人日记》,其中光绪三十三年《丁未日记》有与友人一起宴请端方及杨守敬等人、送折扇请杨守敬题画、端方招饮莫愁湖时杨守敬同席等记载^②,而光绪三十二年《丙午日记》中则没有杨守敬在南京的记录。将这些情况与墓志铭拓本跋文所署日期综合起来分析,可以判断杨守敬这次到南京、上海小住的时间应该是在1907年,把四种隋代墓志的拓本转让甘翰臣、将《隋美人董氏墓志铭》等拓本付石印等事均在此时,《邻苏老人年谱》的记载是杨守敬晚年回忆时的错误。因此可以推定,言及杨守敬允赠石印本《董美人墓志》的罗振玉的第一通书札也应当作于1907年。

让我们再看一下这三通书札。第一通书札中有“昨畅聆大教”、“兹遣力走顾”等语,内容涉及对前一天见面和承蒙赠书的感谢之辞及派下人前往取书等事,由此可见罗振玉当时正在武昌。第二通书札中有“武昌小住,得拜大教”及“玉于十一由鄂启行,十二抵都”等语,可知是在第一通书札之后,由武昌回到京师不久后写作的。另外,第二通书札向杨守敬询问是否藏有潘祖荫所藏克鼎的拓本云:“潘文勤所藏克鼎拓本,尊笥中已有否?如无,亦拟寄赠,缘敝藏二分也。”第六通书札则有“克鼎、虢季子白盘,敝藏皆有两本,以其一寄奉,祈赐存”,显然是得到杨守敬回信之后的回复,因此可以推断,第六通书札写作时间应当在第二通书札之后。从第六通书札最后的寒暄语“冬寒伏请为道珍重”还可以知道,此札作于是年冬天。

第三通书札中谓日前见到刻工陶子霖(一般写做“陶子麟”)时未拿到约定的书籍云:“前陶子霖来,得奉赐教。(中略)但承赐之书及转赠蒋君之书未曾收到,或陶君行时未及携都耶?”据此可知当时罗振玉身在北京。书札中有“近印《李义山集》、《方泉诗》,敬寄一部”之语,当指罗振玉宣统元年(1909)影印出版的唐李商隐《李义山诗集》(钱谦益钞校本)和宋周文璞《方

①张海林:《端方与清末新政》,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40页。

②三月廿三日:“偕傅若生、况夔生请午帅、瑞莘儒、杨惺吾、杨子晴、吴康伯、程乐庵、宗子岱小饮。”三月廿五日:“送折扇与杨惺吾求画。”四月辛酉朔:“陶帅招饮莫愁湖,郑苏龛、杨惺吾、傅若生、梅子肇、陈百年、宗子岱、吴康伯、杨子晴、况夔生全席。”(见缪荃孙:《艺风老人日记》第五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稿本影印本,1986年,第1952-1955页。)

泉先生诗集》(朱彝尊钞本)。从这些内容可以判断,第三通书札是宣统元年(1909)作于北京。第四通书札内容包括收到杨守敬刊刻书籍、支付代价十四元及欲购《访古志》一部、自己将于十三日出发等事。因为比较简短,又无可借以推断的线索,目前难以判定其写作年代。

根据以上对书札内容的考察,除了写作年不明的第四通之外,我们可以将收入《罗振玉手札》中的书札按写作时间重新排列为以下顺序:

- 1.第一通 清光绪三十三年丁未(1907)某月初八日
- 2.第二通 清光绪三十三年丁未(1907)某月二十二日
- 3.第六通 清光绪三十三年丁未(1907)冬某月初三日
- 4.第三通 清宣统元年己酉九月八日(1909年10月21日)
- 5.第七通 清宣统二年庚戌正月十八日(1910年2月27日)
- 6.第八通 清宣统二年庚戌(1910)[二~五月]十三日
- 7.第五通 清宣统二年庚戌(1910)[七月以前]二十五日
- [待考]第四通 某年某月十三日

二、关于书札的意义与价值

据笔者管见,《罗振玉手札》收录的八通书札是至今最早公布的罗振玉致杨守敬的书札。而且,这些信札的写作时间恰好是罗振玉最初接触敦煌文书、着手进行敦煌研究以及致力于甲骨文和殷商历史研究的时期。因此,这些书札对研究罗、杨二人交游以及考察罗振玉学术进程都是十分重要的基本资料。

书札中与这一时期罗振玉学术兴趣相关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有关敦煌文书的话题。

敦煌藏经洞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被当地的王道士发现,但是这个重要的消息却是在分别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光绪三十四年(1908)到达敦煌的匈牙利出生的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和法国的东方学者伯希和将大量经卷、古写本及画卷运到海外之后才被当时以北京为中心的中国学界所了解。宣统元年(1909),伯希和在结束了第二次敦煌调查之后来到北京,罗振玉、蒋黼、王仁俊、董康、王国维以及日本的旧书店文求堂的店主田中庆太郎等到苏州胡同伯希和的住所访问,见到了一部分伯希和在敦煌得到的古钞本、拓本和早期印刷品。关于当时的心情,罗振玉曾在其回忆录《集蓼编》中用“诧为奇宝”四字加以形容。罗振玉等人立刻征得伯希和的同意,对其中一些资料进行抄录和摄影,又向清政府学部建议通过陕甘总督收购敦煌文书,并设法防止文书向国外流失。与此同时,即刻开始对资料进行研究,并着手准备公布出版。一个月之后的九月二十五日发行的《东方杂志》第六卷第十期发表了罗振玉的文章《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对敦煌石室的位置、敦煌文书发现的过程以及在伯希和处见到的十八种敦煌文书和已经运往法国的三十一一种残卷的目录进行介绍。与罗振玉同时访问伯希和的王仁俊也在同年九月石印出版了《敦煌石室真

迹》。紧接着,罗振玉在十月二十五日和十一月二十五日发行的《东方杂志》第六卷十一期、十二期上发表《莫高窟石室秘录》,在第十期杂志上发表的《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的基础之上,将内容加以扩充,把敦煌遗品分为书卷、雕本、石刻、经象、壁画、古器物等六类,并在《馀记》中从订正史书记载、探究印刷技术起源等角度,对利用敦煌资料进行历史考证做出了最初的尝试。《莫高窟石室秘录》在同年由董康诵芬室出版了单行本,翌年即宣统二年(1910)改题《鸣沙山石室秘录》,由国粹学报社出版^①。宣统元年(1909)十二月,罗振玉将从伯希和处得到的敦煌文书加以录文、考证,与友人蒋黻辑录的《沙州文录》等合为一编,题名《敦煌石室遗书》,由董康诵芬室排版印行出版。宣统二年(1910),他将敦煌壁画、钞本、印本和拓本等共十六类资料的照片编为《石室秘宝》出版。此后,宣统三年(1911)出版《佚籍丛残初编》,1913年出版《鸣沙石室佚书》等,这些敦煌资料与研究成果的接连出版,在当时关心古典学术的知识分子之间引起了很大的影响。

如上文所述,本文介绍的第三通书札作于宣统元年九月八日,距罗振玉在伯希和处初次见到敦煌文书尚不到一个月。信中有“拙著记敦煌藏书事一篇附呈,先生见之,当为竊歎矣”之语,从写作时间看,所附文章应当就是两星期之后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竊歎”乃边叹息边反复啜泣之状,形容悲伤的样子^②。写下这些文字的罗振玉大约可以想象,读到他的来信和所附文章时的杨守敬一定会和他自己见到敦煌文书以及得知其中已有不少流失海外的时候一样深感震惊和痛心。

数月之后的宣统二年正月十八日写下的第七通书札中云:“去年秋,法人伯希和学士得我敦煌石室古书,舶载而去,此至可痛惜”,再次表达了对伯希和将敦煌藏书运往国外的痛惜之情,同时又给杨守敬寄去了《石室遗书》和“目录一册”。如上文所述,这里的《石室遗书》即前一年十二月刚刚出版的《敦煌石室遗书》,“目录一册”则指董康诵芬室出版的《莫高窟石室秘录》单行本。另外,信中提到的“影本已制玻璃板,俟印成再奉寄也”,当是指不久即将出版的《石室秘宝》。

在宣统二年二月至五月之间写下的第八通书札中,罗振玉在对杨守敬的《水经注》研究大加称赏之后云:“敦煌新出之《沙州志》、《西州志》,不知于大著《水经注疏》有裨益否?便祈示知?”《沙州志》残卷和《西州志》残卷都是罗振玉从伯希和处得到的敦煌资料,经罗振玉加以《校录札记》,已经收入随第七通书札寄给杨守敬的《敦煌石室遗书》。从这里的只言片语之中也可以看

①另外,由东方杂志社编辑的《东方文库》第七十一种《考古学零简》中也收录有《莫高窟石室秘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

②《汉书》卷五十三《景十三王传》:“臣闻悲者不可为竊歎,思者不可为叹息。”师古曰:“竊,古累字。累,重也。歎,歎歎也。”

到,罗振玉希望了解杨守敬对敦煌地志资料价值的评价,并期待这些资料对杨守敬撰写《水经注疏》有所帮助。

几乎与热心致力于敦煌资料的研究及出版活动的相同,罗振玉在殷商文字和历史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飞跃性的进展。罗振玉光绪二十七年(1901)在刘鹗处首次见到甲骨,当时即对其价值予以很高评价,后来又积极支持、协助刘鹗编辑出版《铁云藏龟》,并为《铁云藏龟》撰写序文^①。宣统元年(1909),罗振玉读到日本人学者林泰辅寄来的论文《关于清国河南省汤阴县发现的龟甲牛骨》^②,以此为契机,他开始着手整理研究自己以前收藏的拓本和新收集的甲骨实物。罗振玉光绪三十四年(1908)就已经从古董商人那里听说,世人所谓甲骨出土于河南汤阴、羑里的说法乃是商人们为垄断信息而制造的烟幕,甲骨真正的出土地是河南安阳县的小屯^③。这时更根据文献记录加以考证,终于证明安阳小屯是殷代晚期都城殷墟的遗址,甲骨卜辞是殷室王朝的遗物。他还从甲骨卜辞中发现了商王的名谥,在证明其与《史记·殷世家》记载几乎完全符合的同时,还指出了《史记》记载的错误。宣统二年(1910)夏,罗振玉出版了他的研究成果《殷商贞卜文字考》,除考释甲骨文字外,在商代卜法的研究以及利用卜辞资料考证殷商历史的方法方面,也为后来的甲骨学和商代史研究奠定了基础。

从内容和写作时间上看,第八通书札中所云“玉近草《殷墟文存》,乃写录近来出土之龟甲牛骨上卜辞”应当是指罗振玉当时正在编撰《殷商贞卜文字考》,“东西洋学者亦有考证,均尚未精确”一语应当是意识到林泰辅论文的措辞。对甲骨真正出土地的调查和证明安阳小屯乃是商都殷墟的研究为从学术研究的角度采集、研究甲骨以及后来大规模科学发掘殷墟开辟了道路,在甲骨文和商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在第八通及第五通书札中,罗振玉向杨守敬透露了他内心的喜悦之情,并向杨守敬确认俗称安阳河是否即是洹水。这些讨论文字与《殷商贞卜文字考》考史第一《殷之都城》中“今此龟甲兽骨实出于安阳县城西五里之小屯,当洹水(俗名安阳河)之阳”的结论显然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殷商贞卜文字考》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考出了卜辞所见的成汤至帝辛十七位商王的名谥,而罗振玉在书札中告诉杨守敬他考出了《史记·殷世家》记载一致的十三位帝王庙号。这段文字让我们得以窥见罗振玉得出最后结论

①“文敏殉国难,所藏悉归丹徒刘氏,又翌年传至江南。予一见诧为国宝,怱怱刘君亟拓墨,为选千纸付影印。”(罗振玉:《殷商贞卜文字考》序,1910年。)“于是尽墨刘氏所藏千馀,为编印之。”(罗振玉:《殷墟书契前编》序,1912年。)

②林泰辅:《清国河南省汤阴县发见の龟甲牛骨に就きて》,《史学杂志》第二十卷第八-十期,1909年8月-10月。

③罗振玉:《殷墟古器物图录》序。

之前的具体研究过程,是研究近代学术史时一件有意思的资料。

在这八通书札中,除了涉及有关敦煌资料、甲骨文和商代史研究的最新信息之外,有些细微之处也能令人窥见罗振玉学问视野的广博和见识的高深。例如,第六通书札中有如下文字:

《唐蕃连盟碑》,前人仅见碑阳,多未见阴侧。此碑传本至少,敝处有旧拓整张,先生何不印入碑影内?又《平百济》、《刘仁愿》两碑,尊藏已有否?乞示知。

这里的《唐蕃连盟碑》是指纪元八二三年在拉萨大昭寺前建立的纪念唐与吐蕃王朝会盟的《唐蕃会盟碑》拓本。该碑碑文的内容见于《大清一统志》、《卫藏图识》、《西藏记》、《全唐文》和《八琼室金石补正》等著作,但这些书中均未收录碑阴(东侧)的吐蕃文与南北侧面的资料,只录有碑阳(西侧)的汉文部分。罗振玉收藏有包括碑阴和侧面在内的全部碑文的旧拓,并将其收入宣统元年(1909)出版的《神州国光集》第七集中。这是最早出版的收录《唐蕃会盟碑》四个侧面碑文拓本照片的资料,王尧《吐蕃金石录》、李方桂《古代西藏碑文研究》^①等有关《唐蕃会盟碑》的力作中都对其加以利用,由此亦可证其价值之高。书札中提到的“《平百济》、《刘仁愿》两碑”分别指韩国忠清南道定林寺五层石塔下雕刻的《大唐平百济国碑铭》(660)和为纪念唐代将军刘仁愿功绩建立的《刘仁愿记功碑》(663),是中韩关系史上重要的石刻资料。对西藏和韩国金石资料的重视,显示出罗振玉的博识卓见。

另外一个能够显示罗振玉辨识文献资料价值的眼光的事例是第七通书札中有关日本传存的《古文尚书》古钞本的内容:

再有愚者:前读《留真谱》,见尊藏《古文尚书·盘庚》卷子。兹因石室《顾命》残本,遂欲将传世诸《古文尚书》断简汇刻为一书。去冬从东友购得《洪范》、《金縢》、《族羹》、《微子之命》四篇(旁注:去冬几至断炊,而质书画得百元购之。同辈多以得伪古本,讥诮不已,不顾也。都中士夫不信古写本,至可叹也),又从日本西京神田氏假其所藏之《泰誓》、《牧誓》影照,拟并假长者所藏之《盘庚》合刊之。若肯割爱见让,俾与《洪范》等四篇合并,尤荷高谊。价当遵示奉缴也。冒昧陈乞,尚祈矜其好古之愚而许之,幸甚幸甚。

“石室《顾命》残本”指罗振玉等人从伯希和处得到的在敦煌发现的《古文尚书·顾命》残卷资料,罗振玉《敦煌石室遗书》有该资料的录文与考证,《石室秘宝乙集》、《鸣沙石室佚书》等书则收录了该资料的照片。“去冬从东友购得《洪范》、《金縢》、《族羹》、《微子之命》四篇”指宣统元年(1909)从日本古

^①王尧:《吐蕃金石录》,文物出版社,1982年;李方桂等著,王启龙译:《古代西藏碑文研究》,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6年。

书商处购得的《古文尚书》古钞本^①，“日本西京神田氏”则是指到日本访问时认识的京都学者神田香岩。关于日本传世的《古文尚书》残卷，罗振玉后来在1911年出版的《国学丛刊》发表了《隶古定尚书孔传唐写本残卷校字记》，1928年又将敦煌《尚书》残卷与日本传世的唐钞本编为《古写隶古定尚书真本残卷》，由东方学会石印出版。根据这通书札，我们可以知道，罗振玉在更早的时期就注意到日本传世的古钞本的文献价值，在整理敦煌《古文尚书·顾命》残卷时，已经开始计划将杨守敬《留真谱》所收《盘庚》、神田香岩收藏的《泰誓》、《牧誓》以及自己的藏品等尚存于世的所有《古文尚书》古钞本残卷汇集出版。在近代学术史上，最早对日本所藏唐钞本以及保留宋刻本以前的文献面貌的日本古钞本的文献价值予以高度评价、并积极向国人加以介绍的学者当推杨守敬，罗振玉继之而起，并更加积极地利用创造各种条件，试图更系统地研究和出版这些唐钞本和日本古钞本资料。正如杨守敬曾多次指出当时中国学者对日本传存的古钞本缺乏认识那样，罗振玉也在书札中对当时中国学者不肯相信日本古钞本的偏见发出叹息。

以上我们考察了罗振玉致杨守敬书札的学术背景以及其中所反映的罗振玉当时的学术动向，下面对书札中反映出的罗振玉与杨守敬的交游关系进行分析。

笔者以前曾经指出，杨守敬与罗振玉虽然年龄相差较大，社会地位、影响力也各有不同，但是，在激烈动荡的清末社会中，二人都有一种保存和研究传统文化的强烈责任感，无论在何种环境下都不曾放弃著书立说和搜求、整理及出版各种珍贵的古代文献资料的努力^②。本文讨论的八通书札的主要内容也都与学问相关，可以窥见二人的交谊主要是以学术的交流为中心的。

八通书札在内容上的共同点是有关研究资料的交流。除了相互赠送各自的著作和研究成果以外，还以赠送、借阅或购买等方式相互提供各自所有的书籍、拓片等资料，显然，协助对方查找、收集研究资料是他们日常交往中的经常性行为。因此，通过对书札内容的分析，可以看出他们学术研究的具体进展过程以及二人之间的关系与相互影响。

例如，在第一通书札中，罗振玉对杨守敬馈赠《贞元释教录》、石印《董美人墓志》和《悉昙字记》等资料表示感谢。其中《贞元释教录》即《贞元新定释教目录》，是唐释圆照奉敕命编撰的佛教经典目录，该书在中国早已散佚，在日本则有传本存世，是所谓“佚存书”的一种。根据罗振玉《大云书库藏书题

①据《永丰乡人行年录》记载，罗振玉1909年访日回国之后，“田伏侯复于东京某故家为购得古写本《尚书孔氏传·周书·洪范》等五篇残卷”，这些《尚书》古钞本与罗振玉所说“从东友购得”的四篇之间的关系待考。

②拙稿《关于杨守敬与罗振玉的交往》，（《杨守敬と罗振玉との交友（二）いて》），《书论》第三十二辑（罗振玉特集），日本书论研究会，2001年，第126-138页。

识》，罗振玉得知杨守敬有从日本带回的日本享保年间据高丽藏覆刻本，希望能够借抄，而杨守敬以该书篇幅较大，抄写不易，所以干脆将其赠送给罗振玉。对此，罗振玉十分感激，写下“异日当劝有力者重雕，俾不负杨君见惠之雅意也”^①，表示将来一定要找机会出版此书，以报答杨守敬的好意。书札中提到的《悉昙字记》乃唐释智广撰著的关于梵文的著作，也是中国已经佚失而日本尚存的佚存书之一。从书札内容看，罗振玉最早得到的该书也是来自杨守敬的馈赠。根据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宣统三年（1911）六月二十五日杨守敬致罗振玉书札，杨守敬曾经为汪康年刊刻《悉昙字记》和同样是由日本带回的《黄帝明堂经》、《帝范》等书，1911年，罗振玉为了将这些书收入他正在筹划编辑的《国学丛刊》，曾经和杨守敬商讨过购买书版的问题^②。但是因为两个月后辛亥革命爆发，这一计划也中断了。1912年，杨守敬在向罗振玉报告自己革命之后状况的信中写道：“足下之《悉昙字记》等版本亦未毁，此后尚未可知也。”此后，在1913年致罗振玉信中又云：“《悉昙字记》、《黄帝明堂经》、《帝范》三巾箱□□已嘱陶子霖送上，未见收信，想未必送也。”可见，当时正在上海避难的杨守敬自己也已经无法掌握关于这些书版的具体情况了。1916年，寓居日本的罗振玉将日本学者收藏的古钞本影印出版，该书卷末有罗振玉跋语云：

予往在京师，亡友杨惺吾舍人守敬曾为予在鄂中刻此书。辛亥国难，杨君避地上海，尚逢书言板固无恙，而未尝见寄。及舍人物化，遂无从索取。然印本尚存在行笈，盖即据通行本重刊者。

所述即是这前后的经过。在研究和向中国学术界介绍日本保存的悉昙学典籍方面，罗振玉及其三子罗福苕有筌路蓝缕之功，这通书札则显示出，在更早的阶段，杨守敬也曾参与《悉昙字记》的收集和出版。

上文曾经指出，在初次看到敦煌文献以及在甲骨研究方面取得进展的时候，罗振玉都是随时将最新的学术信息和自己的研究成果向杨守敬通报，并主动向杨守敬提供有可能对其研究有用的消息和资料。从罗振玉向杨守敬请教安阳河与洹水的关系及对杨守敬《北凉沮渠安周造寺功德碑》跋文的称赞也可看出他对杨守敬学问的尊敬及对其学识的高度评价。在这些书札中，对杨守敬来说最为难忘的当是第八通书札中的下列内容：

·长者《水经注》之学不仅为本朝第一，其精思足与王氏之训诂、段氏之小学并驾。尝与友人论学，谓本朝之学，以王、段二家及长者之水地，罗、李之天算为本朝四绝学。金石学之博大，虽过于宋以来诸家，然非如此四者之独绝也。此海内之公论，非玉一人之管见。陈之先生，当不以为阿私也。也就是说，罗振玉不仅认为杨守敬《水经注》研究为清代第一，而且将他的学

①罗振玉：《贞松老人遗稿乙集》之二，1943年。

②中国国家图书馆藏《邻苏老人手札》。关于这些书札的考察，请参看拙稿《关于杨守敬与罗振玉的交往》。

识与清代学者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训诂学、段玉裁的小学、罗士琳、李善兰的天文算术之学并称为“本朝四绝学”，并且强调这绝不是自己个人的管见，而是“海内之公论”。罗振玉的这一称赏是对杨守敬学问的最高评价，杨守敬在后来的人生中曾多次提及，并由此引罗振玉为知音。1911年，杨守敬受辛亥革命的影响，将大量藏书留在武昌逃往上海，在艰难的避难生活中继续写作已经花费多年心血的巨著《水经注疏》。撰写于这一时期的《邻苏老人年谱》中引述罗振玉对其在历史地理学方面成就的评价曰：

上虞罗叔蕴振玉得吾书叹赏之，谓吾地理之学与王怀祖念孙、段若膺玉裁之小学、李壬叔善兰之算学为本朝三绝学。推挹过当，但不知后世以为如何也。^①

他在致罗振玉的信中也说：“昨年又蒙足下证成其说，以比王怀祖、段茂堂、李壬叔，合之为三绝学。虽不敢当，然大贤之言，信从必众。”引用罗振玉的评价，请求罗振玉出面支持他用集股刻书的方式印行《水经注疏》^②。在现在保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杨守敬晚年书札——如致李盛铎、王先谦等人的书札——中，也频频引用罗振玉的评价向人证明《水经注疏》的价值，希望借以说服他们帮助自己出版《水经注疏》^③。直到罗振玉因反对杨守敬到北京为新政府服务不再和杨守敬来往之后，杨守敬还写信给罗振玉，恳求他为《水经注疏》作序，甚至有“即足下鄙其人，曷垂念所学乎”^④之语。可见，直到人生的最后一刻，他仍然感念罗振玉对自己著作的理解。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罗振玉对杨守敬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高度评价，已经成为杨守敬晚年巨大的精神支柱。

以上，我们对上海书画出版社近年影印出版的《罗振玉手札》一书中收录的罗振致杨守敬书札的写作时间、学术背景以及书札的内容进行了考察，并对这些书札的意义与价值进行了分析。杨守敬和罗振玉都是勤于动笔的人，从他们的著述中也可以看到二人学问上往来的痕迹，但是《罗振玉手札》中收录的还是目前唯一可以见到的罗振玉致杨守敬的书信资料。这些书札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他们学术研究的具体过程，而且为研究二人之间的学术往来和学问上的传承关系也提供了珍贵的线索，是研究杨守敬、罗振玉以及他们二人交游关系的宝贵资料。

作者工作单位：日本国文学研究资料馆

①杨守敬：《邻苏老人年谱》光绪乙巳年（1905）。不过，杨守敬把将王、段做为两家计算的“四绝学”记为做为一家计算的“三绝学”。以下同。

②《寄罗振玉之一》，《杨守敬题跋书信遗稿》，第182页。

③《寄李盛铎》，《杨守敬题跋书信遗稿》，第195页，《寄王先谦之二》，同书第211页。

④罗振玉：《五十日梦痕录》，《雪堂丛刻》，1915年。